

廟堂 之高



陳錫文

王新奎

高尚全

邵寧

他們都是省部級官員，可謂居廟堂之高。不過，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並非純官員，而是居於廟堂的專家。

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陳錫文一直是中國制定農村政策的參與者之一，更被視為中國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也被稱作是真懂中國農村的官員。

1956 年，高尚全在《人民日報》上發文，呼籲要給企業一點自主權，這是他發出的第一次改革呼聲。此後在中國改革的幾乎每一次重要關口，高尚全均未缺席。

在很多國企高管眼中，邵寧是一位真懂國企的領導，也是一位學者。那天，邵寧不用看一眼筆記本，便把二十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梳理了一遍。

王新奎更是坦言：“我從來沒把自己當官員看，我擔任過的職務除大學校長外，都是半名譽性質的。確切地說，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僚。”

他們作為“最懂行的官員”，究竟是怎樣為中國發展尋路的？



我與中國農村 50 年

陳錫文



1950 年 7 月生於上海。1968 年 9 月，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8 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歷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農民是中國社會最懂得感恩的階層，質樸、勤懇、誠實等性格都和這一條有關。現在的問題是，社會的價值取向不能把這些給泯滅了，我們制定制度和政策要把握好導向。農民保留的那些最傳統的東西，是做人最需要的。懂得了感恩，才知道敬畏，才知道應該限制自己的哪些行為，不然就會放縱。”

北京，博學胡同一號。

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築，並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著一條窄窄的府右街，與中南海緊鄰。而且大門口只有門牌號，以及站崗的軍人。這些都說明，這裏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就在這個院子裏。在二樓，67歲的陳錫文走過來與我握手，微笑著略做幾句寒暄，便開始了我們歷時三個半小時的長談。

如果從他1968年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算起，他已經跟中國農村打了近半個世紀的交道；如果從他1978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算起，他研究中國農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陳錫文卸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對中國農村的關注與思考，並未停歇。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陳錫文一直是中國制定農村政策的參與者之一，更被視為中國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也被稱作是真懂中國農村的官員。

我說，有一個敏感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就是轉基因。現在各方的爭論越



來越激烈，轉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沒法溝通的事，你對轉基因是什麼態度？陳錫文略思考，說：“這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按理來說，門外漢不適合談這個，因為不懂嘛。”

在陳錫文看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上對轉基因的討論過於情感化，都是情緒。比如，有些人很激動地說，美國人自己從來不吃轉基因食物，種了都賣給中國人吃。“這是天大的笑話！確實有很多美國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轉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國的轉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經過去20年了。”

但為何美國對此的爭論遠沒有我們激烈？

陳錫文坦率地表示，很重要的一條原因，是美國政府長期監管很嚴格，尤其是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強。他們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規範，凡是通過了FDA的嚴格論證，美國民眾就認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國人對這個問題不太關注，他們相信FDA。”

很多美國人不知道自己吃了轉基因食品，那現在國際上對轉基因的標注一般是怎麼規定的呢？

陳錫文透露，從全球來看，大致是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美國，不用標注，由FDA確保食品安全。現在也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但聯邦立法還是傾向於繼續不標，有些州可能會要求標注。

第二種是歐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標注的，但他們有個限量。比如，歐盟規定加工食品中轉基因物質的含量超過0.5%，必須標注。日本是超過5%要標注。

第三種類型就是中國。我們規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轉基因物質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須標注。

這些不同的規定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各國對轉基因的不同態度。

2015年，陳錫文為轉基因問題去歐洲考察，發現法國已經基本停止研究了。他去了才知道，這裏面有政黨政治的因素。

薩爾科齊競選總統時，法國社會有兩大憂慮，一是核電，二是轉基因，反對主力是綠黨。薩爾科齊就跟綠黨談判，要求對方不要反對核電，因為核

電在法國總發電量佔比相當高。作為交換條件，他答應上台後停止發展轉基因。後來奧朗德上台，也延續了這個政策。

“國際上的差別非常大。法國是最崇尚自由的國家吧，但他們對轉基因是最嚴厲的，以至於到現在，法國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研究轉基因了，試驗田都沒了，科學家都跑到別的國家去了。”

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英國都比較開放，特別是西班牙，轉基因玉米種得非常多。因為它處在地中海沿岸，很適合種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蟲，如果大量使用農藥對環境污染太嚴重，所以他們接受轉基因。英國也在繼續搞試驗，沒有遭到太大的反對。

接下來必須言歸正傳，說說中國政府對轉基因究竟持什麼態度。陳錫文對我說，我們國家採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三點。

第一，轉基因是生物育種，是當今生命科學的前沿，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不能在這個領域沒有一席之地。法國本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很強的，但如果停頓一二十年，法國可能會吃大虧，種子市場可能就被人家佔了。

第二，批准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必須經過極為嚴格的審查，確保安全才可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批准上市的國產轉基因食用農產品，只有木瓜；允許種植的還有轉基因棉花；允許進口的有轉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沒有別的。

第三，要確保公眾有足夠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就是轉基因食用農產品和含有轉基因物質的加工食品必須標識。你願意吃就買，不願意吃就不買。

既然中國政府對轉基因的態度如此明確，為什麼關於轉基因的爭論近乎成了死結？在陳錫文看來，關鍵是現在不少反對轉基因的人，不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證明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從陰謀論、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釋，那就沒有辦法討論了。

“很多事情，包括轉基因問題，不是只靠科普能夠解決的，有的人不是從科學角度討論問題，跟他們講科普沒用。”

轉基因之爭，最終要靠什麼來解決？陳錫文的回答非常簡單：時間。

“恐怕得讓時間來證明。美國人已經吃了 20 年轉基因食物了，如果當年

是小孩的話，現在已經為人父母了。應該做個科學調查，看看這些人有沒有問題，他們生出來的孩子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但有些人還是固執地堅持認為有問題，是沒道理的。”

但有人說，他們自己沒問題，孩子也沒問題，但如果轉基因對人類的危害是隔代才能顯現的呢？陳錫文坦言：“那我就沒有辦法說了，只能再等吧，現在是 20 年，也許要等到 50 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希望總有一天，能夠證明究竟有沒有危害。”

陳錫文當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同學周其仁曾對我說：“錫文黑黑的，很樸實，長得很像農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這些年農村政策的延續性。”

陳錫文生於上海，有不少人開玩笑說：“一個上海人居然管了這麼多年中國農村。”我問他現在還能說上海話嗎？他馬上用上海話回答，謙稱說得馬馬虎虎。

從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沒有人進來打擾，水也是陳錫文自己倒的。無論是自己的人生經歷，還是轉基因等熱點問題，或者是對中國農村未來的思考，陳錫文有問必答，非常坦率。他拿著一杯茶，無須任何提示，所有數字都信手拈來，這麼多年的農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腦子裏。

數年前，有位媒體同行曾說，陳錫文給她最大的印象是實在。我的感受則是，他不僅實在，而且深刻犀利。



高淵：你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就直接參與中國農村問題的決策。但讓很多人驚訝的是，你居然是上海人。

陳錫文：是啊，我祖籍江蘇丹陽，出生在上海，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都在上海南匯縣的周浦鎮。解放前，我父親從老家到上海工作，認識了我母親，在上海成了家。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需要培養幹部，我父親又去上了無錫文化教育學院，這是一所幹部速成學校。他上學的時候我出生了，所以我叫“錫文”。他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老區建設，就去了泰山腳下的山東泰安中學教書，母親也帶著我去了。

但我母親身體不太好，就帶我從泰安回了她的老家杭州。到了我五歲的時候，父親調動工作，分配到了當時還屬於江蘇省的南匯縣周浦中學教書，這樣我們就在周浦安家了，後來上學一直在那兒。

高淵：你初中畢業那年，正好碰上“文革”爆發？

陳錫文：對，1966 年我初中畢業，畢業前就亂了。一開始還有點熱情，到了那年 10 月底，我覺得實在沒意思，就約了幾個同學結伴去南方，到沒去過的地方看看。那時候“文革”搞串聯，坐火車不要錢。

我們一路跑到海南島，這時中央發通知了，要求停止乘車串聯，徒步可以，如果人已經在外地，可以領票返回。我們就在海南島待了一段時間，1967 年的春節在那兒過的。回來後到學校看看，還是亂哄哄的，就回杭州了。

高淵：什麼時候去的北大荒？

陳錫文：到了 1968 年夏天，周浦中學給我發電報，說學校開始分配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來招人，如果想去就趕緊回來。我馬上就回去了，8 月份報的名，9 月中旬就去黑龍江了。

我去的時候，毛主席還沒有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所以我們這批人走的時候，心態基本上差不



多——既然有機會出去自食其力，那就去吧，別再讓家裏養著了。而且，當時把去黑龍江屯墾戍邊的意義提得很高，我們都有點激情。

到了 1968 年底，毛主席那個指示下來後，1969 年就“一片紅”了，大家都得下去。我們屬於自願的被動選擇，所以也沒什麼好埋怨。

我被分到了黑河地區，是黑龍江緯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那個地方無霜期很短，一年只有 110 天左右，只能種小麥和大豆。我們所在的具體位置是五大連池，有水源，所以我們也試著種過水稻，但不成功。

那時候機械化水平不高，即使現在也沒有完全解決，下雨就要拿著鐮刀鋤頭下地幹活。各種農活我都幹過，後來到了機關，也經常要下去一起幹農活。

高淵：建設兵團的真實狀況如何，生活苦不苦？

陳錫文：兵團雖然也是務農，但跟農村差別很大。兵團的前身是農墾局，我們叫農業工人，在當時的國家職工序列上有一欄就叫“農業工人”。所以去了之後，至少是衣食不愁。

後來不少上海知青到我們邊上的農村插隊，那待遇就不一樣了，得自己掙工分，掙了工分才能分口糧和現金，還要看所在的生產隊經營得怎麼樣。我們兵團是大鍋飯體制，實行糧食配給制，像我這樣的普通農業工人，一個月定量是 42 斤。

我們的固定工資是一個月 32 塊錢。但農業工人和工廠裏的工人不一樣，沒有八小時工作制，需要幹就得多幹。當時兵團的算法是，這 32 塊錢，刨除法定假日後是 25 天半的工資，折算過來，一天就是 1.25 元。

在農場，尤其是基層連排一級的幹部，都是當地老農場的工人，他們都想多掙一點。反正節假日也沒事幹，基本上每月要出勤 30 天，工資就有三十七八塊。所以兵團和在農村插隊很不一樣，我們沒有他們的那種後顧之憂。

高淵：從 18 歲到 28 歲，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在黑龍江度過，你怎麼評價那十年？

陳錫文：不能說那一段對我有好或者多不好，但畢竟從個人來講，還

是一段很重要的歷練。

我在那兒待了十年，其實真正在基層幹活也就三年多。後來我做連隊的文書出納，再到團裏和師裏當新聞幹事，編簡報、辦讀書班、參加工作組下基層等，也有機會讀一些書。

這段時間讓我了解了農業的不易，了解了節氣，了解了各種作物不同的特性，了解春播夏鋤秋收，了解了農業機械，等等。另外，我們農場那些老職工，基本都是從山東、河北一帶來的，最早都被稱作“盲流”，因為老家吃不飽，自己跑過來了，本質上還是農民。所以，我對農業、農村、農民有了一些實際感受。

田埂上的廣播

高淵：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你是從哪裏知道的？

陳錫文：那時我正在柳河“五七”幹校上學，算是後備幹部了。這所幹校在“文革”中很有名，跟現在的省委黨校差不多。就在報到的當晚，我和幾個同學吃過晚飯，到幹校邊的田埂上散步。這時，幹校的廣播喇叭響了，說要恢復高考了。

我們一聽都很激動，馬上去跟學校請假。學校說這可不行，你們是層層審批推薦來的，要想回去參加高考，必須得到原單位批准。

高淵：這個不難吧？

陳錫文：我也是這麼想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縣城，給我所在的一師師部發電報，要求請假回來考試。但一連等了三天，根本沒有回覆。我想這樣等下去不行，就跟學校打了個招呼，跑回去了。

找到政治部主任，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你不同意也得回一個電報啊。他說，我就在想，這個電報我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但如果你意志堅定呢，肯定自己會跑回來的。

我記得很清楚，照片交了，五毛錢報名費也交了。大概過了十來天，省



裏突然來了個通知，規定凡是25歲以上的，必須有高中學歷，才能參加高考。我那時已經27歲了，沒上過高中，這下真是踏空。

高淵：這個政策是黑龍江自己制定的？

陳錫文：對，這是土政策。當時黑龍江最大的憂慮是，來這裏的外地知青太多，而且多數是從大城市來的，總體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如果讓這些知青都參加高考，當地人可能就沒機會了。

報名就這樣被退回來了，當然很沮喪。後來聽說中央批評了黑龍江的這個做法。

高淵：好在不到半年，1978年的高考就開始了。

陳錫文：是的，77屆那年是冬天考試，1978年春節過後開學。我們78屆是6月份考試，9月份開學。考了政治、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當時不要求考外語，我五門課總分是379分，還算不錯。

填志願比考試難，我完全不懂，就去請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革”前的大學生。他也說不大清楚，只說了一些原則，比如學校要好、專業要自己喜歡，等等。

我就問他中國人民大學怎麼樣，他說那當然好。然後我看了半天，發現有個農業經濟專業，問他這是做什麼的，他說反正跟農業和經營管理有關吧。

他最後跟我說：“你畢業以後，至少可以回來當個農業會計。”

杜潤生的三句話

高淵：聽說人民大學還沒開學，你就去報到了？

陳錫文：我是人民大學1978年復校後，第一個報到的學生。那天是9月22日，有兩個軍人在校門口站崗，我給他們看了錄取通知書，他們一臉詫異地說：“沒聽說開學啊，也沒有學生來報到。”但還是放我進去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在兵團接到的通知是9月中下旬開學，然後我就去了

哈爾濱，因為有不少熟悉的知青已經在哈爾濱上大學了，我去找他們玩幾天，所以沒收到人民大學的第二份通知。那是通知我們因為校園還被部隊佔用，推遲一個月開學。

那時學校確實沒法住，我就只能先回上海了，到了 10 月中旬再去北京。

高淵：你上大學時，農村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吧？

陳錫文：那時候，全國有幾千萬知青下鄉，都在農村生活了好幾年。貧困在當時是普遍的，但大家到了農村才知道農村窮成了什麼樣。雖然已經離開農村了，但都盼著農村盡快好起來，也願意為農村做點事，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就更這樣想。這是我們普遍的心結。

我那時已經 28 歲了，離開學校 12 年後有機會再讀書，真是起早貪黑。在比我們年長些的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啓發下，我們自發組織讀書會和討論會，還有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學校的學生一起參加。主題從來沒有離開過農村，討論人民公社體制、農村社會主義的內涵、農業現代化等，也慢慢接觸西方經濟學和社會學。

高淵：你們是怎麼討論的？

陳錫文：過程非常自由，願意來就來，來了不願意聽就走。經常今天在這個學校，明天在那個學校，最熱鬧的時候有一兩百人。慢慢地，我們就想，除了討論，能不能再做點事，比如對農村進行一些調查研究。

正好那個時候，中國社科院從中科院裏獨立出來了，在科研體制上也有一些改革，可以對外委託調研課題。我們就說能不能以一個研究組的名義，向社科院申請課題。

還有個機緣。這個讀書小組裏，北大經濟系的鄧英淘是鄧力群的兒子，我們人大經濟系的杜鷹是鄧力群的女婿，而鄧力群當時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這樣，鄧力群就知道我們這批人在做農村問題研究，給了我們一筆 5000 元的課題費，這在當時就很不少了。

拿到經費後，我們就想：乾脆成立一個組織吧！那時候沒有什麼社團登記之類的，就在 1981 年初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我記得是 1981 年的 2 月，還在寒假中，在北京大學召開成立會議，因為當時北大經濟系的黨總支書記和北大的經濟學泰斗陳岱孫都很支持。鄧力群和杜潤生都來了，他們都講到國家百廢待興，非常需要年輕人關注國家大事，而農村問題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大難題。

杜潤生代表農口的老同志歡迎青年人加入這支隊伍。他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和農民大國，農民如果還貧困，那麼國家就富裕不了，農業如果還停留在古代，國家就不可能現代化。聽了這兩句話，我覺得真是振聾發聵。

高淵：從那時起，你就決心這輩子研究農村問題了？

陳錫文：那天，杜老還說了一句話。他說，進入農村調查研究這個領域就不容易，堅持下去更難，堅持到底是難上加難。

我當時想，我已經當了十年農民，又是讀農業經濟專業的人，我以後做什麼呢？必須選擇這個工作了。就這樣一直做了三十多年，去年剛剛退出一線崗位，我算做到了杜老說的堅持到底。

下鄉調研的“老大”

高淵：這個研究組成立後，你們第一個去調研的地方是哪裏？

陳錫文：去了安徽滁縣，就是現在的滁州。那是 1981 年暑假，由國家農委出面，一共去了四五十個人，分成很多小組，深入到當地各個地方，調研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以來的新變化。

我和一個同學被派到小崗村蹲點，一住就是 18 天。跟當初在生死狀上按手印的 18 戶農民朝夕相處，了解到改革前窮到什麼程度，改革過程中的擔驚受怕以及成為農村改革一面旗幟的全過程。

從 1978 年底開始，兩年多時間，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去的時候是夏天，還沒有夏收，但村裏的糧食已經多得吃不了了。村民跟我說，以前鄉裏的糧庫空得都能跑出鬼來，現在家家戶戶屋子裏都堆滿了稻穀和小麥，雞飛在上面吃也沒人管。在調研中，我確實感受到了體制的變化給農民帶來

的巨大喜悅。

高淵：你後來還多次去過小崗村吧？

陳錫文：去過很多次，有兩次還是分別陪著前後兩位總書記去的。每次去，村裏那些老人老遠就叫我，都上來跟我擁抱。

他們都叫我“老大”，1981年在村裏蹲點的時候，就這麼叫的。我當時還說，你們歲數都比我大，怎麼可以這麼叫呢？他們說，你是中央來的啊。

後來我每次回小崗村，一進村他們就說“老大回來了”，關係非常好，有什麼情況和問題都願意告訴我。

高淵：調研報告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陳錫文：後來形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調研報告，對每個層面都做了剖析，既講了變化，也講了下一步可能面臨的問題。報告出來已經是1981年秋冬了，鄧力群和杜潤生親自看、親自改，最後報到中央。

當時的中央領導做了批示，認為這個報告把“雙包到戶”以後的情況講明白了。於是，報告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很多內部簡報都轉發了。

高淵：這次調研的成功，對後來畢業分配有沒有產生影響？

陳錫文：因為“文革”的關係，當時國家機關已經有十多年沒進年輕人了，幹部年齡普遍老化。到了1982年的春天，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高校選拔一批畢業生，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工作，解決青黃不接的問題。

當時比較現成的就是我們這個農村發展組，正好都要畢業了，於是決定第一批留下我們。一下子批了50個編制，專門從事農村調查研究。

鄧力群和杜潤生專門討論過，把我們留下來後到底擱在哪兒？後來是鄧力群定的，他說不要去黨政機關，因為我們都是小字輩，去那裏每天無非就是擦桌子、掃地、打開水，還是乾脆放到社科院，這樣自由一些，可以集中精力搞調研。

就這樣，我們50個人的編制統統給了中國社科院，進了農業經濟研究所。而且，連“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個名稱也一起帶了過去，等於在農經所增設了一個研究室。



難忘的“九號院”

高淵：在中國社科院感覺怎麼樣？

陳錫文：其實我們去之前，上面是跟社科院講清楚的，這些人放在你們這兒，但工作要聽兩個研究室，就是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農村政策研究室，鄧力群和杜潤生已經分別調到這兩個研究室當主任了。我們很多調研工作，是由這兩個研究室直接派的任務。

高淵：這個機制是否有點不順？

陳錫文：對啊，確實不太順。1982年以後，全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了，尤其是企業和價格改革。到了1984年在莫干山開中青年改革研討會前，中央就在考慮，在國家體改委下面設“體制改革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成立後，對我們這個組影響很大，去了不少人。當然，還有些人繼續堅守，只是人數已經大大減少。

再加上本來機制上就不順，杜老就想乾脆在他的農研室（它的另一塊牌子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面也成立一個研究所。到了1985年夏天，我們這些還留在社科院的人，包括那50個編制，一起轉到了農研室。

高淵：在那個著名的九號院裏，當時名人不少吧？

陳錫文：我們這個所是1986年春天掛牌的，辦公並不在九號院裏，因為沒房子了。但西黃城根南街九號是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的辦公地點，杜老他們都在九號院辦公，因此我們經常要去匯報工作和領受任務。

九號院是清朝的禮王府，當時華國鋒、姚依林、張勁夫等都住在九號院，紀登奎也在農研中心任研究員。第一任所長是王岐山，我當副所長。所裏有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林毅夫當時還在社科院農村所，後來杜老下決心把他調過來，也當副所長。到了1989年初，王岐山正式去了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我就接任了所長，副所長除了林毅夫，還有杜鷹。

我們各自學的專業真的是五花八門，有學物理的、地質的、機械的，學什麼的都有，反而學農業和農業經濟的很少。

但讀什麼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經歷，都關注農村問

題，都對“文革”有比較深刻的反思。而且大家來自各個學科，形成了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這比在一個學科裏面討論問題，肯定要深刻得多。

高淵：你們是什麼時候分開的？

陳錫文：那是 1990 年的中央機構改革，農研室撤銷了，我們被安排到了很多部門，包括農業部、體改委，以及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兩個政策研究室。我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先後擔任農村研究部副部長、部長和中心副主任。

1994 年我被借調到中財辦。1992 年底，鄧小平同志把當時中央的幾位領導人叫去，強調黨管經濟這個原則不能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還是要恢復。另外，經過 80 年代末一番變化之後，有一段時間國務院沒有明確分管農業的副總理了，各地反應很大，畢竟我們是農業大國啊。

這樣到了 1993 年的春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就同時成立了。根據慣例，財經小組的組長由總書記擔任，農村小組的第一任組長是朱鎔基同志，他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常務副總理，後來就一直由分管農業的副總理擔任組長。這個小組是中共中央領導農業農村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對農業農村工作領域的重大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後報中央決策，並協調和督促貫徹落實。

高淵：當時兩個領導小組是不是下屬同一個辦公室？

陳錫文：對的，這個辦公室對外就叫“中財辦”，裏面有個專門對應農村領導小組的秘書組。到 2003 年，我調任中財辦副主任，對應農村工作，就徹底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了。

高淵：“中農辦”這塊牌子是什麼時候打出來的？

陳錫文：是 2006 年。2005 年制定的“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就研究，新農村建設的指導協調工作到底由誰負責？權衡再三之後，決定不增設新的部門，而是加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過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是由八個單位的負責人組成，那次擴大到 20 個部門。中財辦裏對應農村的這一個組，原來就 7 個人，增加到 15 個



人，並設為兩個局。同時也明確提出，“中農辦”這個牌子要打出來，同意設一個主任、一到兩個副主任。

對我來說，其實也沒什麼實際變化，我還是中財辦副主任，只是又加了一個中農辦主任的頭銜。到了 2009 年，中央又任命我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明確為正部長級。

不討論“18 億畝紅線”

高淵：前幾年，“18 億畝耕地紅線”（以下簡稱“18 億畝紅線”）曾引發不小爭議。這條紅線是什麼時候提出來的？

陳錫文：那是 2003 年，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裏提出來的。但在之前，也提過“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那年全國耕地總面積是 18.51 億畝，而工業化、城鎮化是一定要佔地的，在 1998 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中就已經提出了“佔補平衡”，哪裏的建設佔用了耕地，必須在別的地方補出來。

高淵：當時不少人反對這條紅線，爭議的焦點在哪裏？

陳錫文：我跟反對“18 億畝紅線”的人有過討論，我發現他們的經濟學理論功底非常深厚，但對農業基本不懂。我們討論的結果是，我目瞪口呆，他們也目瞪口呆。

比如，他們認為這個“18 億畝”是拍腦袋拍出來的。我說憑什麼這樣講？他們就給我算賬，說 1 畝地如果產糧 800 斤，18 億畝地產的糧食，全國人民根本吃不了。

我說，你們到底了不了解農業？必須知道，有的地方是一年兩季，有的地方是一年三季，所以每年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其實是 24 億畝。而 24 億畝裏，每年種糧食的面積大概是 16-17 億畝，最多的時候超過 18 億畝，現在是 17 億畝以下。還有七八億畝地幹什麼的？要吃菜，要吃油，還要吃水果啊。他們根本不懂播種面積這個概念。